

《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的概况》中的宁波

田力

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年),又译作德俾士、戴维斯、爹核士,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外交官。1813年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书记员。1816年随阿美士德使团到北京,充任汉文翻译官。1832年任东印度公司广州特派委员会主席。1834年被选任为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1844年起担任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兼驻港英军总司令等职。1846年亲率英舰抵定海,与中方办理舟山交割事宜。1848年离职回国,1854年获KCB勋衔,1890年以95岁高龄辞世。德庇时一生执著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是英国研究中国文学与语言的权威,在诗歌、小说、戏曲等方面均有力作。此外,德庇时还著有多本以中国为主题的通论性和普及性作品,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1836年出版的《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的概况》(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以下简称《中国人》)。该书被认为是19世纪对中国最为全面的报道,有多个欧洲语种文本。直至民国初年,辜鸿铭在北大课堂上还宣称“至今大部分英国人对于中国知识的了解还是源于德庇时爵士的书本”。

《中国人》一书分两卷,共21章,第一卷有10章,标题分别为:“早期与欧洲的交往”、“与英国人的交往”、“与英国人的交往(续)”、“中国地理概况”、“中国历史概要”、“政府与立法”、“性格与行为方式”、“风俗习惯”、“风俗习惯(续)”、“城市——北京”;第二卷有11章,分别为“城市——南京和广州”、“宗教——儒教”、“宗教——佛教”、“宗教——道教”、“语言与文学”、“文学(续)”、“工艺与发明”、“科学”、“自然历史与物产”、“农业与数据统计”、“商业贸易”。书中对西方人在宁波的早期活动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与回顾。比如谈到明朝嘉靖时期,葡萄牙人占据宁波的双屿港,进行贸易的史事:

“费尔南·德·安德拉德(葡萄牙商人、官员——译者注)指挥的一支由八艘海船组成的舰队,在抵达中国沿海时,被中国的战船包围,其行动受到监视。但他仍然获准率两艘船前往广州。在成功谈成生意的同时,却收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其余六艘船都遭到了海盗的袭击,其中几艘满载着货物回到马六甲,剩余几艘则在来自琉球群岛的一些帆船的陪同下,驶向中国东部沿海的福建省,并在宁波成功建立一个殖民地。此后,葡萄牙人带着他们的家眷相继来到这个港口,与中国的其它港口以及日本做起了赚钱的贸易。但是,由于葡萄牙人的恶劣行径,当地政府于1545年将他们驱逐出境。从此,葡萄牙人永远失去了这个中国大陆上的据点,而此处本是中华帝国各省份中最适宜发展对欧洲贸易的地区之一。”

又讲述了16世纪葡萄牙冒险家平托与宁波的故事:

“平托在和一群亡命之徒抵达宁波后,他从当地人口中得知,在此地东北方的一座岛上,有17座中国古代王陵,里面埋藏了无数的珍宝。平托和他的同伴们成功地找到了那个地方并且洗劫了王陵,获得大量的白银。由于遭到攻击,他们只能携带部分战利品撤退。而在撤退途中,又在南京附近遭遇风灾,仅有14个葡萄牙人幸免于难。但他们又被中国人俘虏,在受到一番虐待后,被送到南京。……之后又被押往北京,……被判处一年劳役。但在劳役期满之前,他们就被鞑靼人释放了,因为后者当时正在大举



1815年,德庇时在澳门期间撰写的《字典》手稿

入侵中国。……后来,平托和他的伙伴们离开鞑靼人,在沿海登船重返宁波。不幸的是,他们被遗弃在一座孤岛上,差点饿死在那里,幸得一个海盗相救,不久之后,逆风将他们送到了日本沿海。”

这段材料显然是德庇时从平托的《远游记》中获得的。实际上,德庇时的著作中融合和借鉴了大量前人留下的文献,并且从编年史的角度进行梳理和分析,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该书付梓之时,正是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夜,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将目光投注到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为了让普通读者对于中英间的交往历史和现状有所了解,作者列举了大量的事例,这其中也有不少是与宁波相关的,比如著名的“洪仁辉事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8世纪中叶,广州的中英贸易发展迅速,同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于以粤海关为主体的广州贸易体制也愈加不满,因为“种种陋规使关税的实际征收率大大高于法定税额”,在粤海关饱受“胁迫勒索”的英国商人“热望重新开展浙江宁波的贸易”。175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来甬贸易,并指派已经在广州生活数年的翻译洪仁辉(James Flint)同行:

“1755年,蛤蚧生与洪仁辉被派往宁波,如有可能,他们想重建那里的贸易渠道。抵达宁波之后,他们受到很好的款待,那里的税费似乎比在广州要低许多。抚院,或者叫副总督,十分欢迎他们前来贸易,几乎认可了英国人提出的所有条件,但他这么做,似也超出了其权限范围;因为当‘霍尔德内斯’号利用这一机会,随即前往宁波,彼时正在该省的总督却命令他们交出所有的枪炮、小型武器和弹药,并要缴纳与广州一样的关税。尽管抚院不能直接违反这道指令,但也没有遵从,而是将总督的指令和自己的奏折一道上呈北京。这样,在过渡期内,无论是总督还是他本人,都无权做出最终的决定。由于要到9月底才有可能收到北京的回复,官员们同意开展贸易,但前提是交出一半的枪支弹药。于是,英国人交出了12门大炮,船上的货

物也卸载一空。不过,‘霍尔德内斯’号向官员们支付了2000两银子,其它的税费是广州的两倍,而且还不被允许住在岸上。政府禁止在宁波进行贸易‘对于皇帝来说是税收收入的损失,因为茶叶和其它商品走陆路运到广州会增加许多成本’。当然,这种情况也导致欧洲商人购买那些商品的成本增加了。大班们即将离开宁波之时,当地官员正式通知他们,宁波港以后禁止开展任何贸易活动。抵达澳门后,地方政府官员以类似方式告知,根据法令,只能限定在广州进行贸易。

1759年,英国人设在宁波的商馆被拆除,曾与他们做生意的行商也奉命离开该地,兵船阻止任何英国船只在舟山补充给养。尽管如此,洪仁辉先生依然前往宁波。广州方面获悉此事后,禁止其返回广州,并表示,一旦发现他再次在广州出现,就将其遣送回英。洪仁辉抵达宁波后,发现所有沟通的大门都对他关闭了。于是他前往北京附近,并且成功地让皇帝知道了他的控诉。皇帝派了一名有地位的官员作为钦差,带洪仁辉经陆路到广州。钦差与其它官员一起对粤海关监督进行了审判。洪仁辉先生抵达广州后,在城里停留了10天,然后去了商馆。两天后,中国钦差接见了所有外国人,并告知粤海关监督已经被降职,将由另外一位官员取代他的职务;而且,除了对货物征收的6%的关税和每艘船1950两的‘规礼银’之外,其它所有税费都被免除。”

“洪仁辉事件”的影响极为深远。经此事件后,清朝政府于1759年12月颁发“防范外夷规条”,这是清朝第一个全面管制外国商人的章程,是“闭关政策”的具体体现,广州一口通商制度至此彻底完备。宁波也深受“闭关政策”之害,此后对外贸易一蹶不振,本来可以成为沟通中西的东方大港,却被闭塞的清朝政府硬生生地切断了与西方的联系,殊为可叹。

《中国人》一书对于这些史事的记载,虽然有一些细节上的漏洞和错误,但是所体现出来的态度是理性、温和的,并尽量保持客观,在那个西方对华认识转向负面的时代是很少见的。

档案馆

责编乐建中 美编雷林燕 照排马喜春
2019年3月3日 星期日

投稿E-mail: jiz@cnnb.com.cn



NINGBO ARCHIVES
宁波档案